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周恩来的大外交

【加】罗纳德·C.基思（Ronald C. Keith）著

封长虹 译

〔图文珍藏版〕



西方世界公认的解读中国大外交的奠基之作

大外交的根本原则

**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
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周恩来的大外交

【加】罗纳德·C.基思 (Ronald C. Keith) 著

封长虹 译



[图文珍藏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恩来的大外交 / [加]基思著; 封长虹译.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7

ISBN 978-7-5125-0519-3

I. ①周… II. ①基… ②封… III. ①周恩来 (1898 ~ 1976) — 生平事迹 ②外交史 — 史料 — 中国 — 现代 IV. ① K827=7 ②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9740 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3-3734 号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by RONALD C. KEITH

Copyright: © Ronald C. Keith, 1989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under the title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by Ronald C. Keith.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Palgrave Macmillan.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Sinoread Culture &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周恩来的大外交

- | | |
|------|------------------------|
| 作 者 | [加] 罗纳德·C. 基思 |
| 译 者 | 封长虹 |
| 责任编辑 | 郑淑璐 |
| 统筹监制 | 葛宏峰 王文侠 |
| 策划编辑 | 福茂茂 廉 勇 |
| 美术编辑 | 李丹丹 |
| 市场推广 | 胡红叶 |
| 出版发行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经 销 |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
| 印 刷 |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
| | 21.5 印张 181 千字 |
| 版 次 |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
| |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25-0519-3 |
| 定 价 | 39.80 元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1551 传真: (010) 64271578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传真: (010) 64271187-800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摄 影
(按音序排列)

鲍乃镛	曹兴华	陈正青
陈之平	成元功	崔宝林
丁翔起	杜修贤	高 风
高 粮	高振普	官天一
郭占英	何世尧	侯 波
花 皑	黄新民	胡宝玉
康矛召	雷明明	李宝坤
李虎臣	李基禄	李九龄
刘东鳌	刘庆瑞	刘少山
李学增	吕厚民	吕相友
孟庆彪	梦 珊	孟昭瑞
钱嗣杰	乔治·洛蒂	
齐观山	齐铁砚	盛承天
苏俊慧	塔吉·古拉	
唐理奎	汤庆森	童小鹏
王一兵	王永宏	吴化学
吴 群	徐大刚	雪 印
许万育	徐肖冰	袁 浩
袁汝逊	俞沛文	张 彬
张 举	赵黄岗	赵 炜
赵行杰	郑茂相	郑小箴
邹健东		

声 明

在此，我们对为本书作出了贡献的人们，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图片作者的姓名可能有遗漏，在此深表歉意。

需要说明的是，对部分图片作者，因地址不详而无法联系，也无法支付报酬。请作者见书后与我们联系。

CONTENTS | 目录

001		绪 论	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
019		第一章	革命中造就的外交家
051		第二章	冷战期间组建外交部
091		第三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遏制政策的对抗
139		第四章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苏分裂
185		第五章	周恩来、尼赫鲁及遭到破坏的“亚非团结”
235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275		第七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方针和现实主义精神
323		第八章	周恩来的遗产：走向“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绪 论

革命实践中的理性外交

周恩来的大外交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外交实践在历史上常常被认为是欧洲的君臣外交，然而，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却出现在中国革命大动荡这一混乱环境之中。很明显，周恩来的外交是产生于中国具体的国内氛围之中的，但其本身却具



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周恩来

有重大的国际意义。作为一个旅欧的中国留学生，他对欧洲的外交实践有着清晰的认识。在他成年后的岁月里，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他不得不亲自与欧洲的国家体制对大多数的亚非国家所造成的扩张影响进行斗争。

作为一个鞠躬尽瘁的革命者，他常常与欧洲各国外交所维持的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发生冲突，而当后者要加固这种不平等

的模式并增强亚洲及非洲国家对殖民主义的依赖时，这种冲突则显得尤为激烈了。

周恩来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显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周恩来所了解的中国革命经历是否排除了“理性”的外交实践呢？周恩来最终是个革命外交家，而国际上则公认他为完美的外交家。



周恩来和国际友人在一起

作为从1949年至1958年2月的外交部长及1949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为止的国家总理，他对中国的外交实践影响巨大并推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杰出的“人民外交”，并制定了对外进

行援助的方针。他的“理性”外交在看起来难以消除的冷战气氛中灵活地战胜了美国的遏制。后来，他那敏锐的智慧和顽强的政治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人们所能忍耐的最大极限的考验。然而，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看到要从根本上对中国的国际政治联盟进行重建和扩大，还为当代中国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人们对周恩来的外交所作的一些描写，是现代中国外交史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然而，人们对他的外交生涯所进行的研究既容易引起争议，同时也进行得很艰难。除了少数情况之外，中国国内的一些文章只能是对周的过去和往事进行缅怀，并由此来分析他的外交原则和外交实践。国内的政治因素，尤其是那种早已把个人传记与“个人崇拜”等同起来的现象，都抑制了中国人对周恩来的研究。

西方有一些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但这些传记常常把周的外交技巧和对外政策作为对他的根本心理因素进行附带分析，并以此来解释他那复杂的政治品格。约翰·鲁茨在传记中指出，冷战期间，西方新闻机构都被周这个“神秘人物”所吸引，从而对他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描绘，如“灵活的布尔什维克”、“弹性的共产主义者”、“中国的斯芬克斯^①”，等等。

①原文为Sphinx，意为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比喻为“谜一般的人物”。

——译者注

甚至在周恩来去世之后，他这个“谜一般的人物”仍然引起了许多观察分析家的好奇。这些人想通过对周的性格进行心理分析来解释他的“实用主义”。迪克·威尔逊在他所写的《周恩来传》中，则想通过周恩来那种难以理解的情感和动机的复杂性来对周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进行解释。威尔逊得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结论，说周恩来“用不同的方法使自己处身于不同的文明之中”。许多外国人已看到了周的

行为和特征所具有的价值（这一点对外国人本身来讲看得很重），而这一事实则说明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外交家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航筹交错中儒雅的周恩来

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发生冲突时的困境中仍然能够获得妥协，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得到解释。一些外国崇敬者——尤其是法国人，把他的个人魅力比作当代具有儒家学究气的君子。尼赫鲁在20世纪50年代曾确信，古代中华文明久负盛誉的传统最终将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中再次得到体现。甚至那些曾在外交事务中与周恩来共事过至今仍然健在的人都强调说，周的外交战略与中国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

然而，周恩来自己对儒家历史的态度则是复杂的。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驳斥过蒋介石虚伪的“诚实品质”，并把蒋介石“固守中庸”看成是对“传统的一般意识和剥削阶级的伪善”的一种反应。然而，1949年4月，周在与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也承认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分析传统”需要对儒家历史的积极方面进行研究。儒家历史中“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与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不一致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目前的分析认为儒家学说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导及外交具有某种联系。

例如，舜乐于不耻下问，并善于研究由于不同意见而造

成的冲突，以便把握冲突的两个极端，从而在决策中制定“不偏不倚”的方针。“中庸之道”表现了一种“不卑不亢”的修养，而这似乎与现代外交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这种“不偏不倚”与共产党的辩证法思想是不一致的。后者既强调对立，又强调统一，这个原则是复杂的政治现实环境中得以灵活运用的唯一思想基础。这种灵活性由于在对“客观”现实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它有别于“庸俗进化论”。

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周在其外交政策中是否接受了“实用”的“权力平衡”。基辛格认为，周对欧洲古典的权力平衡具有一种直感。一些观察家把这种平衡的现代实践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战略实践。在造就周的外交过程中表现出的中国古典思想和战略所造成的影响是不可轻视的，同样，人们对当代中国的分析也是不可轻视的，因为这种分析描绘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周恩来的外交风格的实际和现实内容。邓小平在1976年1月15日追悼周恩来大会上所致的悼词中，并没有反映出周在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带有矛盾之处，并强调周在国际上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及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

对周恩来所具有的中国人的性格进行研究是很有用处的，周恩来的“外交”是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



外交场合中的周恩来总是保持微笑

的缠绕中演变而来的。如果说周恩来在国际事务中是个“现实主义者”，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且，对他的外交所进行的综合性解释与说明都包含了中国式马列主义的思想范畴。“工作作风”、“方针政策”之类的概念在周恩来有关领导原则和涉及对现实进行观察的政策和方法、对国内外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的思想发展过程

中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思想进行研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外交与一般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就会确切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的实践。

“工作作风”这一概念起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思想上讲，它包含了一种自律的标准，对“客观”政治现实的一种良好的策略上的反应，政策发展过程中的集体与民主协商以及个人的研究和深入调查，而所有这些都是基于“实事求是”这一认识论基础之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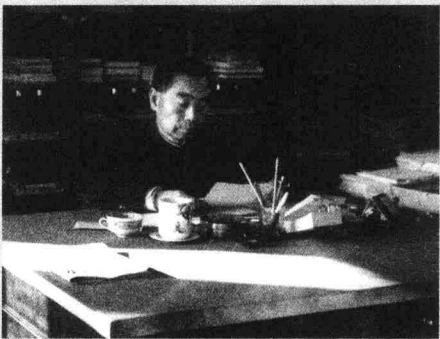
“方针”与“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两者在使用过程中几乎可以相互交换。这两者放在一起则被认为是“指导路线”。弗兰兹·舒尔曼对两者进行了区分，认为“政策”指的是“具体的政策”，而“方针”指的是“总体的

政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对两者进行了更为清楚的区分，认为“方针”指的是一种指导思想的理论，与指导路线相关，而“政策”则指的是一套实施原则，或叫“行动准则”。

尽管周恩来在西方受到人们的推崇，被人们看成无与伦比的外交家，但是，他对“外交”的解释与西方国家教科书中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已故的赫德利·布尔教授认为，外交是“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通过官方用和平方法在世界事务中具有立足之地的其他实体之间的行为关系”。周恩来确实认为在国与国之间有必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和平谈判，但是，他把“外交”看成是某种方式的战争的继续。周恩来曾向一些年轻但却思想敏感的外交官讲述过“两种战争”的区别，认为“外交”是一种与“枪战”相反的“舌战”。

周恩来最终还是希望寻求一种世界政治的转变。他把“外交”看成一种高度的政治化过程，它既不局限于世界政治中“具有立足之地的实体”，也不把它看成是“官方的代理人”。在抵制美国的遏制及获得更为广泛的国际承认的斗争中，周恩来十分重视国际舆论的力量。人们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统一战线政治的舆论实践中发现“人民外交”的起源。

在周恩来看来，宣传工作是外交过程中十分自然且十分



晨曦初照，周恩来在工作。

合理的一部分。在周恩来早期有关工作作风的指示中，他敦促当年在武汉的同事们要做到“五勤”，即要在五个方面做到勤快。这样，他的这些未来的外交家们要阅读毛的著作和党的文件，要倾听并收集各种来自不同地方的意见，要宣传党的政策，要亲自处理外交事务以求“自力更生”，同样，还要走出去与人们接触而不是等待他人前来拜访。“五勤”可以运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工作之中。

周恩来在看起来十分曲折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获得妥协让步而表现出的杰出才能是令人感到神奇的。所以，许多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他的外交是“实用主义”的。为此，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曾对周恩来加以抱怨，说他这样做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周恩来对霍查未能理解列宁的话“妥协再妥协”而感到遗憾。周恩来认为，霍查以及那些跟他一样的教条主义的空想家们没有真正理解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精神。

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正式起源于毛泽东关于“矛盾”和“实践”的辩证法理论。毛泽东关于矛盾的理论要求人们做到实事求是，周恩来在这方面所表现出的“工作作风”总是非常富有理性的。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周恩来

在这一点上表现得非常自如。在外交和对外政策中以及政治活动的所有方面，周恩来的“方针政策”的产生总是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有着明显的关系，从而使其1949年之前在统一战线方面对国内和国际问题的认识得到了人们最大程度的承认。

在西方，外交事务中的“实用主义”似乎意味着这样一种能力，即能够处理因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和国际政治等级结构所造成的不平等而导致的潜在的强权状态。从这种意义上讲，“实用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外交事务中从未正式得到过认可。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周恩来的名字很少与“实用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实用主义”本身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因为它反对科学的、必要的思想方法。然而，周恩来的政治对手曾的确企图把他的“现实主义”当作“经验主义”来看待。在1941年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断而又有效地强调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仅仅是一种书本理论中的主观臆断，往往是会导致失误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被指责犯有“经验主义”的错误；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有人含沙射影地攻击他为

